

南洋學會叢書之二十

星馬史論叢

崔貴強著

新加坡南洋學會

一九七七年

南洋學會叢書之二十

星馬史論叢

崔貴強著

新加坡南洋學會

一九七七年

序 言

蒙南洋學會會長魏維賢先生囑我將過去的舊作彙集起來，出版專書。我當初遲疑了一陣，這些舊作，其中一部份是十多年前撰述的，那時候，自己在漫長的學習歷程中，還是處在摸索的階段，寫出來的東西自然不夠成熟，不成熟的作品有輯成專書的價值嗎？這就是我遲疑不決的原因。

本年三月間，承南洋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資助，遠赴港台一行，蒐集資料作專題研究。在台灣期間，寄寓在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紀念館，研究院是研究學問的好所在，林木蔥蘢、環境清幽，各人都站穩自己的學術崗位，孜孜不倦，皓首群經，相互切磋，濃郁的學術鑽研氣氛，籠罩整個中央研究院。就在這優良環境的蔡元培紀念館裡，我有時在蟲聲唧唧的深夜，有時在薄霧瀰漫的清晨，將舊作一一展閱，一種敝帚自珍的情懷油然而生。我的一些舊作，在資料的蒐集與問題的看法上，固然有不夠圓滿的地方，但仍不失其參考的價值，有些作品，將廣泛的材料歸納起來，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些文章，是其他歷史學者忽略而極饒意義的課題，我辛勤地蒐集資料加以論析。想到了類似這樣的華文著述，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仍未多見，因此，我決心應命，接受魏先生的囑咐，將它們輯成專書問世。

本書的文章主要以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為研究對象。可分

爲兩部份，第一部份是涉及星馬華人的歷史，環繞在十九世紀與廿世紀初年的課題；另一部份是有關星馬歷史的一般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這裡，我懇切盼望讀者給我指正。

最後，我要感謝魏維賢先生的善意，沒有他的催促，就不會有本書的付梓問世。同時，對台北宏業書局東主戴定國先生的鼎力相助，使本書得以順利出版，謹申謝忱。

1977 年 4 月

寫於蔡元培紀念館

目次

序言

晚清的企業經營與星馬華人.....	1
戰前新加坡華族史的特徵.....	24
十九世紀新加坡的華族巨商.....	41
海峽殖民地華人對五四運動的反響.....	62
晚清官吏訪問新加坡.....	77
試論吉蘭丹兩尊中國古炮.....	109
東南亞華人的經濟活動.....	118
吉打早期的貿易.....	133
透視英國統治星馬的本質.....	152
歷史與科學根據	
——評鄭著「開埠前的新加坡」——.....	171
英國對馬來半島的影響	
——論其深度與廣度——.....	178
東南亞社會的變遷.....	198

晚清的企業經營與星馬華人

一、晚滿的政策與推行

對中國海外僑民來說，1860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一年，繼英法聯軍之役后，締結了中英北京和約，規定了中國政府不得禁阻華民赴英國所屬各地或外洋工作，并得查照情形，會訂章程，以謀保護⁽¹⁾。在此之前，中國政府推行海禁政策，禁止人民移殖海外，視海外華民爲天朝棄民，概不聞問。但自此之后，清朝政府的海外移民政策，由敵視改爲護衛，最終導致了海外領館之創設。

中國駐新加坡領事館之創設，可說是濫觴於郭嵩燾之出使英國。1876年間，清廷因馬嘉理事件，派遣郭嵩燾西赴英國，向維多利亞女皇致歉⁽²⁾。嵩燾路過新加坡，稍事勾留，目睹新加坡的商業繁榮與華族龐大的人口，印象頗深。較早時，嵩燾已有意奏請清廷，在新加坡，檳城，孟加拉及錫蘭等地派駐領事⁽³⁾，並取得總理衙門的同意⁽⁴⁾。嵩燾的西行，加速了領事館的設置。1877年，清廷駐新加坡領事館遂正式成立。

第一任領事是胡璇澤，又名亞基及黃埔，是富甲一方的新加坡殷商。1881年後，由左秉隆繼任。秉隆是卓越的行政人員與外交官，在任期間（1881—1889），他一方面極力

改善華人的處境，一方面又與英國殖民官員保持了良好的連繫。直至 1891 年，新加坡才出現了總領事館，第一任總領事是黃憲，一個著名的詩人與外交官。翌年，檳城亦有副領事之設置，由張振勳充當。振勳亦名弼士，是腰纏萬貫的富商，在荷屬東印度群島與檳島擁有許多產業。

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清廷若干位居要津的高官，已認識到海外華民財雄的潛力，奏請清廷予以護衛。兩廣總督張之洞，對海外僑民尤感興趣。在其 1885 年 10 月 11 日的奏議中，述及海外「華民約在百萬以外，粵人最多，閩次之，浙又次之，祇以僑居異土，每受洋人欺凌，群情憤鬱，延頸喁喁，仰冀國威遠加嚴庇」。他滿懷信心地說：「若勸令各埠捐貲購造護商兵船，必所樂從……今爲民謀自衛之方，除大商愿輸巨貲者不計外，假如人捐二元，亦可得數十萬兩，約可造快船五六艘。船成後分赴各埠周巡護商。」⁽⁵⁾

張之洞擬從海外華民捐輸購船的美夢雖未實現，但他却成功地奏請清廷遣使海外，調查華民苦況，徐圖對策。1886 年 8 月 26 日，由副將王榮和與知府余瑞率領的代表團從廣州啓航，遠赴南洋各地觀察。代表團先後訪問了東南亞及澳洲廿餘埠，至翌年秋才揚帆北返國門。他們以荷屬東印度群島與菲律賓的華民受害最深，建議應先在這裏設領保護⁽⁶⁾。

張之洞的購船巡洋計劃，其目的無非是要增強中國的威望與護衛海外華民，爲了擴大中國的海軍實力，清廷於 1887 年向德國購置了四艘戰艦，它們是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與來遠號，是爲後來北洋艦隊的骨幹。上述四戰艦由歐洲歸國途中，於 1887 年 11 月 9 日航抵新加坡商港。該次訪問深獲

新加坡華民的熱烈歡迎。不論是僑生與遷民社會的領袖，都設宴款待來自遠方的客人⁽⁷⁾。同時，艦隊亦公開展覽，公衆人士不分貧富貴賤，踴躍登船參觀⁽⁸⁾。1890年，在提督丁汝昌率領下，北洋艦隊六艘戰艦第二度訪問新加坡⁽⁹⁾。這次訪問與第一次有本質的不同，前次只是路過，這次却負有任重道遠的使命，即揚威異域，護衛僑民，而且戰艦的艦長與將領，清一色是中國人⁽¹⁰⁾。這次來訪的客人，同樣受到當地僑民的熱烈歡迎，不論是廣府、潮州與福建商人都分別設宴款待⁽¹¹⁾。四年後，北洋艦隊第三度訪星，與前兩次一樣，當地華人領袖也給予熱切招待⁽¹²⁾。上述一系列的來訪，顯示了清廷爭取海外華民內向的努力與護僑的決心。

與此同時，清廷也向海外華民尋求財力的支援。每當天災肆虐，災黎遍野之際，政府便向海外華民呼籲接濟。1885年中法戰爭期間，清廷亦呼籲新加坡華人支援罹難者的眷屬。爲了贏取海外華民的財力支援與政治效忠，清廷也推行向海外華民領袖鬻賣官銜的政策⁽¹³⁾。這種政策至少在新加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給當時海峽殖民地的助理華民護衛司G. T. Hare 帶來了極大的惶恐。他向倫敦殖民部大臣呼籲，對那些海峽殖民地與馬來聯邦有功於社會的華人領袖，賜予更多的英殖民官銜，來抗拒清廷的施政⁽¹⁴⁾。顯然地，自1877年後的二十年間，清廷爭取海外華民的內向活動，取得了巨大的成績⁽¹⁵⁾。

中國的近代企業經營，大抵濫觴於1860年的自強運動，它首先致力於發展現代化的軍備，以鞏固國防。經過了曾國藩與李鴻章的努力不懈，終導致了1865年江南兵工廠的創設，製造了若干小型的戰船與砲彈。在此後二十年間，無論是輪船、電

報、鐵道、鋼鐵、煤礦與金礦，都先後經營發展。不過，1894年的中日戰爭，中國的全面潰敗，說明了中國的現代化尤其是國防軍備，較之其他列強，仍是瞠乎其後。中日戰爭的教訓，促使清廷更致力於現代化的發展，到了十九與廿世紀交替間，無論是國人或外人投資經營實業計劃，漸漸付諸實施。

自1875年光緒帝即位後，清廷的財政日益困窘，隨着中日戰爭與義和團事件，政府付出巨額的賠款，國庫日形枯竭，因此，清廷自然無法推行經濟現代的龐大計劃。在這情況下，政府的唯一途徑，便是吸取國內外華人資本家的財富，以資挹注。

如上所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海外華民財富，已引起清廷若干高官的關注，張之洞就曾夢想藉助海外華民輸捐購船護商，據他估計，「華工在美歲得佣值，除日用外，餘悉寄以贍家，歲計約數百萬兩」⁽¹⁶⁾。為激勵僑商捐貲購造護商兵船，對那些慷慨輸將的團體，他奏請「優給獎敘……各埠華商必有神祠書院公所之類，如能捐輸巨款，可否每埠各賞給御書匾額一方，懸於公所，既足以示好義之殊榮，尤足以昭聲教之無外」⁽¹⁷⁾。至於個人捐款充領事經費者，則「獎以虛銜，封典翎枝」⁽¹⁸⁾。薛福成在其1890年2月3日的奏議中，亦說「夫中國貿易，與各國相衡，虧短甚鉅，然尚有可周轉者，以華民六洋所獲之利，足資補苴也……即就新加坡一埠而論，設立領事已十三年，支銷經費，未滿十萬金，然各省賑捐海防捐所獲之款，實已倍之，而商備十四五萬人，其前後携寄回華者，當亦不下一二千萬」。因此，薛福

成堅持應在東南亞英屬各殖民地廣置中國領事館⁽¹⁹⁾。

爲了吸引海外華民歸國投資經營企業，清廷不惜使用各種法寶。首先，政府決定對投資者獎以官銜。1903年，農工商部頒佈了獎勵華商公司章程，三年後加以修訂，其中規定凡集股二十萬圓以上者，擬准作爲本部頭等顧問加頭品頂戴，并請仿寶星式樣，特賜雙龍金牌，准其子孫世襲本部四等顧問官至三代止。至於投資額較少者，所賜予的官銜較低，如投資二十萬圓以上者，獎以五等議員加七品頂戴。又凡商人得有本部顧問官及議員職銜者，均無庸在本部當差，惟遇有關係商務利弊應有建白之事，准其隨時具函逕送本部，祇須敘事詳明，一切體裁概不拘以繩尺，其事或准或教由本部核辦；商人既有本部獎勵職銜，自應優加禮貌，如在京外各處謁見督撫司道等官，自四等顧問官以上，均按京卿儀注，頭等議員以下，均按部員儀注行庭見禮；至於商人集股若干幾本身已有職銜不愿再加本部職銜者，准其具呈聲請，移獎該商之胞兄弟及親子姪，惟不得濫移遠族⁽²⁰⁾。

歸國華民常受地方貪官與莠民欺凌壓詐，導致了海外資本家裹足不前⁽²¹⁾。爲了制止這種不良現象，清廷曾三令五申，頒佈了一系列護僑法令，保證「凡有事回華者，其身家財產均責成該省督撫，嚴飭地方官切實保護……倘有關津丁役地方胥吏及鄉里莠民藉端訛索，即予按律嚴懲，決不寬貸」⁽²²⁾。御史潘慶瀾與福建總督許應騤在1899年的奏議中，亦建議在廈門設立保商局，「遴選正紳妥辦，凡出洋回護之人，均會赴局報明，即爲之照料還鄉，倘仍有擾累情事，准受害人稟而查辦，以資保護而慰商民」⁽²³⁾。翌年，廣東巡

無德壽亦奏請在廣州設立保商總局，「局紳不支薪水，司事等經費月需銀百餘兩，該道功紳商壽捐不動公款，刊印空白護照，分寄外洋各埠之會館紳董，如有四華商民，即將其人姓名籍貫職業填明，并貼照相交本人帶回赴局驗明，如有欺詐等事，報局轉知地方官清理」⁽²⁴⁾。1906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接獲諭令，將護照發給那些有意歸國的僑民⁽²⁵⁾。

自1904年以後，各種現代化企業先後在若干省份推動。鑒於向外國舉債容易捲入外交上的爭執，清廷寧願倚仗海外華民的資財。政府答應僑民的貸款，將享有與外債同等的利率⁽²⁶⁾。但政府屢次食言背信，威信銳減，引起極大非議⁽²⁷⁾。

爲了激勵僑民回國投資經營企業的發展，清廷不時派遣代表到海外去勸說。代表的人數不一，時而是一人單槍匹馬，時而是數人組成，在這些代表中，張振勳或許是最活躍與具有影響力的一個。張振勳原屬客籍，年十七時，由中國移殖巴達維亞，依仗了他的勤奮與機智，短期內便在吧城建立了經濟基業。嗣後，他將其經濟實業擴展到蘇門答臘，板城與彭亨。身爲卓著的種植家，金融業主、礦主、航運業主及其他實業的董事，張振勳不僅贏得馬來亞與荷屬東印度群島同僑的崇敬，亦獲得清廷的寵倖⁽²⁸⁾。1893年，他被委任爲中國駐板島的副領事。兩年後，復被調來新加坡，升任總領事⁽²⁹⁾。他的調任，無疑地協助促進了清政府與東南亞華人社會的直接連繫⁽³⁰⁾。1898年，張振勳奉召返國，協助盛宣懷治理實業發展，做了擬議中粵漢鐵路的總經理。在廣東投資農業生產。1905年，在山東煙台組織了張裕釀酒公司。

1907—1909年間，榮膺廣州中華總商會董事⁽³¹⁾。

張振勳對中國現代化的落後，深表關注。他深信發展商務，是中國擺脫列強經濟侵略的唯一途徑，而農工礦業及鐵路的發展，却要以發展商務為前提。他認為外國商務之所以會發達，是由於商人累積了資本，組織公司，發展農工礦業及鐵路的結果。也只有藉助商人的財富，才能促進現代企業的成功⁽³²⁾。張振勳也強調護衛僑民資本家的重要性，為了吸引更多僑民歸國投資，必須授于虛銜⁽³³⁾。

1896年4月，張振勳奉召回上海，參與發展企業計劃。翌年，他率領代表團回來新加坡，向當地華人推銷中國通商銀行及鐵路的股票⁽³⁴⁾。1898年初再度奉召回國。據稱，同年九月，為了推銷數達兩百萬兩的鐵路股票，再度蒞臨新加坡⁽³⁵⁾。鑒於他對海峽殖民地華人具有極大的影響力，1905年，他再度率領農工商部部員時楚卿訪問新加坡，考察僑民業務。這次他完成了兩項重大的任務。在檳城，他創設了中華學校，開了馬來亞現代華校的先河⁽³⁶⁾。同時，他也成功地說服新加坡各籍商人領袖，於1906年成立了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他率先捐助三千元，以資提倡⁽³⁷⁾。

1903年杪，陳寶琛率領另一個代表團訪問新加坡。他原籍福州，曾在北京做官廿餘年⁽³⁸⁾。他學問淵博，身居高官，深獲閩省人士的崇仰。他這次奉閩浙總督之命南來巡視，表面上以考察教育與商務為名，實際上以銷售漳廈鐵路的股票為實。在新加坡勾留期間，陳寶琛深受當地華人的熱烈歡迎⁽³⁹⁾。他亦曾訪問檳城與吉隆坡⁽⁴⁰⁾。在星馬完成其使命後，陳寶琛於1907年初首途赴爪哇，在那裡銷售了十五萬元

的鐵路股票⁽⁴¹⁾。

1907年3月，由徐經明領導的另一個代表團來到新加坡。徐經明是奉農工商部之命為計劃中的一個龐大企業公司來推銷股票的。公司總行擬設在上海，分行設在新加坡。該公司將經營銀行、輪船與保險等業。在新加坡活動了三週後，代表團復到檳城、吡叻、雪蘭莪、森美蘭、馬六甲、仰光、爪哇、雪梨與墨爾本訪問⁽⁴²⁾。同年10月，徐經明再度來星，進一步推銷其股票。⁽⁴³⁾

在銷售各項股票的過程中，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一般上，中國籌組企業的負責人，常先函告此地的中華總商會，協助宣揚銷售股票的消息。只要籌組的企業有利於中國，總商會無不慷慨予以協助⁽⁴⁴⁾。例如1907年上海的中華總商會擬籌建華商銀行，要求新加坡總商會協助銷售股票。新加坡總商會不僅同意協助，同時派遣林文慶與林竹齋到上海去，協助擬訂章程⁽⁴⁵⁾。

二、對銷售股票的反應

據龔駿在中國新工業發展史大綱的分析，中國的工業化可分為四個階段⁽⁴⁶⁾，即(1) 1862—1877年，是為「軍事工業」發展的階段。隨着1860年英法聯軍進佔北京後，曾國藩、李鴻章與左宗棠等人積極建兵工廠與船塢，生產武器，以期「自強」。(2) 1878—1894年，是為官督商辦的工業發展時期。(3) 1895—1902年，這期間，列強利用了條約中所享有的權益在沿海商港確立其工業基礎。清廷為抗拒外資的威脅，亦採取積極步驟鼓勵工業發展。(4) 1903—1911年，這

階段表現了外資在中國對立的尖銳化，清廷的積極促進工業發展與民間的熱烈響應，過去由官方經營或官督商辦的現象逐漸失去其重要性，由私商經營的企業漸形重要。一般而言，僑民投資中國企業的經營，發生在第四階段。

其實，吸引僑民投資中國官方經營的企業的意念，開始於1890年薛福成的訪問新加坡。那一年，薛福成以代表李鴻章的身份，要求新加坡殷商陳金鐘勸說海峽殖民地的華人投資經營上海機器織布局⁽⁴⁷⁾，結果如何，不得而知。據1895年新加坡報章的報導，閩浙總督曾派代表到新加坡及東南亞其他各埠，勸說各地殷商投資經營福州造船廠⁽⁴⁸⁾，反應如何，亦不知曉。

同治中興（1862—1874）標誌了中國鐵路的開始。

自1885中法戰爭後，愈來愈多官吏主張發展鐵路建設。1889年，清廷諭令張之洞推動京漢鐵路的鋪設⁽⁴⁹⁾，在經費的籌措方面，張之洞主張向外舉債；不過，朝中群臣多認為應揚棄過去「官督商辦」的方式，代之以私人資本及管理⁽⁵⁰⁾。1895年後，擬議中的京漢鐵路加速進行。在張之洞與王文韶的力薦下，盛宣懷被委任為京漢鐵路的總裁⁽⁵¹⁾。作為中國鐵路總局的領導人，盛宣懷負責為京漢鐵路籌措經費。由於中國的資本家財力有限，他們對本厚利薄的鐵路經營表示冷淡，政府只得轉向僑民資本家尋找來源。盛宣懷首先注意到張振勳，當時他是新加坡的代總領事。1896年4月，張振勳奉召返抵上海，參與推動鐵路計劃。不過，那時的張振勳對京漢鐵路的鋪設無多大熱忱。張振勳告訴盛宣懷，海外華人對廣東鐵路的鋪設較有興趣，並準備投資經營⁽⁵²⁾。

於是，吸取僑民資本經營京漢鐵路的計劃，便宣告失敗。

作為粵漢鐵路的總裁，張振勳於1898年重臨東南亞，為粵漢鐵路籌款及銷售股票⁽⁵³⁾。是年杪，張振勳在新加坡設立了一間分局，以便推行股票的銷售⁽⁵⁴⁾。

1895年中日戰爭後，列強擴大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利用了各種條約賦予的權益，俄、法、英、日、德與美國加速了在中國經營鐵道⁽⁵⁵⁾，這嚴重損害到中國的主權，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慨。從1904年後，以私人資本建設鐵道的運動，在中國廣泛展開⁽⁵⁶⁾。

粵漢鐵路籌建初期，因財政拮据，於1900年為美國合興公司接收。三年後，三份之二的股份又被比利時人購去。這時，張之洞乘機建議收回建築利權。為增進路費財源，廣東總督岑春煊上奏朝廷，增抽鹽米稅收，却為廣東紳商與群眾反對，他們堅稱要籌措私人資本繼續鋪設鐵道。岑春煊竟將兩名領導人囚禁，激起群情洶湧，不可收拾。於是在短期間廣東紳民竟籌得二千六百餘萬元，湖南、湖北兩省亦相繼響應⁽⁵⁷⁾。

同時，負責人亦致電報海外僑民，呼籲購買鐵路股票，⁽⁵⁸⁾反應頗令人鼓舞。截至1906年10月，認購額高達二千萬元⁽⁵⁹⁾。在新加坡，羅奇生被委任代理商⁽⁶⁰⁾，他是廣東幫的領袖之一，認股額若干不得而知。在檳城，負責賣股的是南華醫院，至1906年3月，銷售了七萬多股⁽⁶¹⁾。

不過，粵漢鐵路的興建，波折重重。首先是財政拮据，其次是董事間的意見對立，行政效率差，人人假公濟私。股東大會與遴選董事常導致會場大亂，須電召軍警來維持秩序

(62)。1911年，清廷宣佈鐵道國有化政策，粵漢鐵路遂收歸國營(63)。

1903年，張煜南等人向商部申請修建潮汕鐵路。據原來的計劃，鐵道長九十餘哩，資金總額達一百萬兩。該鐵道既有利於交通與開採礦產，故獲得清廷批准申請(64)。翌年，開始投入鋪設工程(65)。潮汕鐵路是中國第一條私人資本經營的鐵路(66)。

張煜南是廣東嘉應州籍人士，亦名張榕軒，是張振勳的侄子。年十七時，從中國移居巴達維亞，很快便成為殷商。嗣後，移居棉蘭，在蘇島各埠經營各種企業，其財富及其對當地華族的影響力，引起了荷蘭政府對他的注意。廿餘年來，他一直被委任為雷珍蘭(Liautenant)、甲必丹(Captain)與瑪腰(Major)(67)。嗣後，張煜南又遷來檳城，被公認為檳城華人社會最有錢有勢的領袖。為了提高其社會地位，張煜南曾向清廷購買官銜(68)。1895年他繼承張振勳被委任為檳城副領事，為清廷政府所倚重。1903年奉召回國，被授予候補四品京堂(69)。他也曾在汕頭創設銀行(70)。

潮汕鐵路的原有資本實際上是不足夠的，張煜南得從其他方面尋覓資本。最後香港一個吳姓的百萬富翁認股五十萬元，另一個暹羅張姓的富豪加股二十餘萬元(71)。超過一百萬元的日本資本，以台灣殷商林麗生的名義，滲透到潮汕鐵路的建設計劃，商部經過一番調查後，證實確有其事。張煜南遂匆匆返國，將林麗生的股票全部購下，事體才算解決。(72)。到了1906年6月，潮汕鐵路的主幹已完成，而支線要到1908年8月才告竣工。翌年9月，潮汕鐵路通車(73)，據

說，每日收支平衡⁽⁷⁴⁾。

接下來，我們要談到漳廈鐵路。1905年，有福建張亨嘉等商人向商部申請建築漳廈鐵路。依張亨嘉的看法，一旦陳寶琛被委任為經理，經費問題便可迎刃而解⁽⁷⁵⁾。申請終獲批准。

1906年11月，陳寶琛抵達新加坡，受到當地華人領袖熱烈歡迎。閩籍商人設宴款待，場面異常熱鬧⁽⁷⁶⁾。陳寶琛打鐵趁熱，乘機在叻報發表了長篇聲明，闡明福建築路的重要性。他強調鐵路不僅有利於商務的發展，亦有鞏固國防的功用，一旦漳廈鐵路完成後，其他鄰近各省如江西、浙江與廣東都蒙受其利⁽⁷⁷⁾。在另一個粵籍人士所設的公宴中，陳寶琛再度呼籲新加坡華人消除畛域觀念，捐棄幫派成見，投資到福建省鐵路的修築⁽⁷⁸⁾。

陳寶琛很快便在新加坡設立銷售股票代理商，多數代理商是閩籍商人與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理事⁽⁷⁹⁾。

據傳，新加坡閩籍巨商劉金榜購買了一萬股；東興號與金福和號可能購買了一萬至一萬五千金股⁽⁸⁰⁾。在檳城，賣去了三萬八千優先股與二萬至三萬普通股。在吉隆坡也有銷售兩萬股的紀錄。最大的認股者或許是怡保的胡子春，據說他買了二十萬股⁽⁸¹⁾。

胡子春亦名胡國廉，生於福建永定縣。1872年十三歲南來檳城，七年後移居吡叻太平，太平以產錫著稱。胡子春投資錫業，成績卓著，被稱為「錫礦大王」。胡子春的經營錫業致富，及其對華人社會的影響力，引起了清廷的注意。自1908年後，胡子春便奉召回國，政府曾就福建、廣東及雲